



# 布瑞頓音樂中的和平主義

## Pacifism in the Music of Lord Benjamin Britten

陳威仰 | Wei-Yang CHEN

國立東華大學音樂學系音樂學助理教授

### 來自薩福克的作曲家

布瑞頓勳爵（Lord Benjamin Britten, 1913-1976）是英國 20 世紀傑出的當代作曲家，他的音樂作品反映了豐富的英格蘭特質，1945 年的歌劇《彼得葛萊姆》（*Peter Grimes*）將布瑞頓推上國際樂壇，同時復興了「英格蘭歌劇」（English opera），在英國當代樂壇中認為他是佛漢威廉士（Vaughan Williams, 1872-1958）的接棒人。

布瑞頓於 1913 年 11 月 22 日出生在英格蘭海邊小鎮 Lowestoft（屬於薩福克郡，Suffolk），父親羅博·布瑞頓（Robert Britten）是牙醫師，母親艾蒂絲（Edith）是業餘的歌唱家，家裡四個孩子（班傑明·布瑞頓與其姐姐芭芭拉、羅伯、貝絲）都從小接觸音樂。布瑞頓 5 歲時開始綻露音樂方面的才華，先是學習鋼琴，十歲時學習中提琴，之後，經由中提琴教師介紹，布瑞頓開始和有名的作曲家布里奇（Frank Bridge, 1879-1941）學習和聲與對位，布里奇影響了布瑞頓在創作時的細膩與自我嚴格要求，同時也培養布瑞頓做為一位真正藝術家應有的態度。

布瑞頓一生的創作數量相當多，充滿豐富的多元特質，直到現在世界各地研究布瑞頓的許多學者，每年都有新的觀察發現，相關的書籍與論文陸續出版。布瑞頓在 1928 年進入英國頂尖學府皇家音樂學院以後，其重要作品依分類大約有：17 部舞台作品、17 首管弦樂、31 首合唱與 25 首獨唱作品。布瑞頓在這之前的少年時期創作，則是在近幾年才被學者進行有系統的整理與研究。

### 作曲家錯綜複雜的人生

音樂的語彙是透析作曲家藝術情感的最佳媒介。我們剖析布瑞頓音樂語意中的詞根，無論是具有語詞的聲樂作品，或是器樂作品中音樂動機的語彙象徵，



隱約透露布瑞頓內心的真實聲音，對社會冷漠的不滿、對政治上主張社會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的腐化，同時，對自身同性戀性向的壓抑，形成一種循環的主題意識以及語詞的意涵。也就是說，作曲家錯綜複雜的人生情節在創作過程中，很明顯地吐露出不斷循環的主題意識：純真、同性戀、和平主義、社會壓迫、死亡象徵（相關的形象，例如：大海、局外人、藝術家等）。<sup>1</sup> 布瑞頓的痛苦大部分來自社會對他的多方批判與指控，最主要集中於他的「拒服兵役、主張和平主義、同性戀以及戀童癖」，這些非議使他一直處於教會傳統或社會道德邊緣的中間。

### 少小夢魘多少回，戰爭痛創揮不去

在布瑞頓音樂作品的歌詞中，特別能夠看到他的和平主義訴求，我們很容易體察出兩股相對的力量，在他的人生性格裡彼此衝突。這些語詞不外乎是：和平與暴力、愛與排斥、年輕與年長、純真與世故、藝術與現實等等。這種矛盾的性格是由何時開始呢？是先天或與生俱來的呢？還是後天環境迫使而改變呢？

布瑞頓曾經在 1971 年一次報社的訪談中，憶及小學時的生活經歷，他曾目睹學校行政人員對

其他同學的體罰並感到震驚：「我曾記得我在學校第一天的日子，我第一次聽到一位男生被體罰，我幾乎被嚇傻了，為何人們都沒有跑去幫助他呢？這時候，瞭解到一種信念是帶有寬恕，並且接納令我震驚事物的意念，是否就是在不自覺當中逐漸產生的呢？」。<sup>2</sup> 對於體罰鞭打的印象一直烙印在布瑞頓的腦海裡，日後也不斷出現在他的一些歌劇場景裡，他刻意表現無辜者受難形象，以凸顯人性對和平的最深渴望。

此外，布瑞頓幼時的記憶也因戰爭蒙上一層陰影，雖然他成長在 Lowestoft 的海邊小鎮，寬闊寧靜的大海伴隨著人們成長，帶給此地的人無限的安慰與沈思，但是好景不常，第一次大戰的砲彈轟炸聲卻粉碎了這一處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良善鎮民之生活夢想。這種戰爭的聲音是布瑞頓幼時遭遇到的恐怖經驗，恐懼的景象曾被呈現在他的一些作品裡面：「《戰爭安魂曲》（*War Requiem*, 1961）令人震驚的『警告』，被世界上數以萬計的人們聆聽到，布瑞頓整個經驗以此做為材料。另外，《挪亞方舟》（*Noah's Ark*, 1957）的和平應許一直到《彼得·葛萊姆》（*Peter Grimes*, 1945）中那種『愚蠢的同胞』對其殘酷而無情的追逐，這些景象皆出自於幼年時第一次經驗到炸彈的轟炸（是指著第一次大戰）。」<sup>3</sup> 布瑞頓的音樂創作所表露的戰



1 布瑞頓與恩師布里奇（Frank Bridge）、師母 Ethel 於 1937 年 1 月在巴黎的合影。布瑞頓親身經驗到布里奇在戰爭中死亡的傷痛。（布瑞頓—皮爾斯基金會提供）

爭經驗，似乎痛斥戰爭罪惡的本質。

人類彼此摧殘的景象，在布瑞頓成年後仍然持續追逐著他，二次大戰中，身邊的恩師或同窗好友亦陸續死於戰火之中。布瑞頓與友人在 1942 年，冒著被德軍潛艇轟炸的危險，仍堅持從美國搭船返回英國家鄉，卻眼見家鄉遭受轟炸，許多老朋友們已經過世，包括恩師布里奇。在此同時，布瑞頓與皮爾斯（Sir Peter Pears, 1910-1986）還要為當初前往美國、拒服兵役的選擇，面對法庭審判與社會輿論撻伐。當時的布瑞頓如何承受對過往之人的思念、痛悼？如同鬼魅般的陰影不斷重創布瑞頓的心靈，或許使他產生極度的不安與恐懼感，在他日後的音樂創作或歌劇裡，仍留有戰爭與人性殘酷造成的創傷，不斷地尋求寬恕與愛來撫平。

## 布瑞頓力倡和平主義

布瑞頓的「和平主義」信念，主要是來自基督教的人格教育所產生的反戰立場。布瑞頓因為個人信仰的理由，以及經歷戰爭的殘酷面而拒絕服兵役，布瑞頓與其摯友皮爾斯都極力表明自身的和平

主義態度，即使面對社會輿論不諒解與批判的壓力，仍舊極力倡導以人道精神為基本價值的和平主義。他們受到許多的諷刺與挖苦，甚至為此面對法院的審判與裁定，布瑞頓感受到人性的黑暗與苦楚，但作曲家心裡壓抑已久的黑暗裡，仍流露著一道微弱的亮光，因為人性本有基督的純真。當孤單的生命對抗無法選擇的殘酷環境，他們面對法院審理時提出的答辯書，如此強烈說到：「……我沒辦法去破壞人的生命，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著上帝裡的聖靈。我成長於英格蘭國教下，但近五年內，我並沒有參加主日，我並不相信基督的神性，是我認為祂的教導純然，祂的榜樣足堪為楷模。我相信讓一位入侵者進入，然後，使他成為好楷模。丹麥允許德國人進來，但並沒有驅逐他們，但目前為止時間仍嫌稍短。我並不反對城市護衛力量，而是反對參與這份力量，助長殺戮。我將願加入皇家軍醫隊（Royal Army Medical Corps），我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非戰鬥單位可服務，但我想到貴格會，找尋一處屬靈家鄉。我為和平主義者創作音樂《和平主義者進行曲》（1937），以及影片《英國的和平》（1936）。假如那些不是為了軍隊的緣故，那麼，

應該也不會有非戰鬥單位了。」<sup>4</sup>

布瑞頓的答辯裡提到，他的人格養成是在英格蘭國教的環境中被塑造，在日後的生活經驗中，宗教不只在品格與道德的層面影響他，更不可否認的是，在他創作意識裡有關於人道精神的立場，上帝的慈悲與耶穌基督的聖愛典範一直是作品裡的中心要旨，音樂裡的象徵與指示符號用來解釋品格與道德，才能有實質意義地談論神性與人性的對照面。當時，布瑞頓特別提到了自己的兩部作品，一首是《和平主義者進行曲》（*Pacifist March*），另一首為《英國的和平》（*Peace of Britain*）。這些作品的創作主題皆為反對戰爭，表現人性本質的不完全，竟可以殘忍無情地對待包含動物在內的其他生命，人性黑暗面的外在行為表現就像戰爭或軍事掠奪，破壞了世界原本的美好秩序。

### 反戰作品《和平主義者進行曲》與《英國的和平》

《和平主義者進行曲》是一首布瑞頓與好友鄧肯（Ronald Duncan, 1914-1982）於1937年合作為Peace Pledge Union所創作的樂曲，<sup>5</sup> 鄧肯自己也是一位「為道德良心而拒服兵役」的和平主義者，兩人正所謂志同道合。他們支持的「The Peace Pledge Union」組織，宗旨是立誓為和平主義而奮鬥，鄧肯曾經借給布瑞頓一本由Richard Gregg所撰寫的書，名為《非暴力的能力》（*The Power of Non Violence*, London, 1935），研究布瑞頓的學者Mervyn Cooke認為「這是影響布瑞頓甚劇的一本書。」<sup>6</sup> 而另一首作品《英國的和平》創作於1936年3月，布瑞頓為一部高度受爭議的同名短片《英國的和平》提供音樂配樂，布瑞頓透過這次編寫影片配樂，以作曲家的身分首度公開表明為「和平主義」而奮鬥的立場。這部短片大約有三分鐘的長度，由Paul Rotha's Strand影片公司製作，音樂搭配影片傳達一個非常強烈的訊息：「寫信給你的議員……藉著理性來要求和平。」<sup>7</sup>

很顯然在1940年之前，布瑞頓就已經使用作

品表現個人對於人性殘忍一面的厭惡感，之後，生活中的反戰訴求更加強化他心裡頭強烈的基督教聖愛信念與實踐人道主義的道德勇氣。所以，布瑞頓、皮爾斯及其創作上的好友亦是英國編導家克羅澤（Eric Crozier, 1914-1994）在1939年共同以離開英國前往美國的具體行動，作為反戰主張的宣告。當時正逢英國在財政上支持「西班牙內戰」，<sup>8</sup> 接著又對德國納粹政府侵略行為正式宣戰，雖然這些戰爭都算師出有名，但是布瑞頓仍期望以人道與理性來抑制人性的殘酷行為。三年後，布瑞頓基於對英國人民的關懷，在戰爭尚未平息的情況底下，他選擇於1942年3月16日登船橫渡大西洋，<sup>9</sup> 同年4月17日返抵英國利物浦。在一個月的危險航行中，承載旅客的船隻常要避開德國潛艇的攻擊，布瑞頓的旅途其實十分艱辛。曾經有些人認為他所聲稱的和平主義只不過是懦弱逃避，不願面對個人應負的責任。但由返鄉一事來看，布瑞頓的和平主義需要更大的勇氣，作曲家即使面對身體生命的威脅與激烈的言論攻擊，仍要表達反戰與追求和平的信念。

### 具有「合一」精神的作品：《安魂交響曲》、《春之交響曲》、《戰爭安魂曲》

若從基督教聖愛與饒恕的教義為核心來審視布瑞頓創作中的和平主義：基督教的「合一」精神，在於透過耶穌基督寬恕與赦罪的態度，「恢復」人性與神性和好的關係，布瑞頓以超越死亡的形象去表現其內心反戰與和平的意念。

在基督教的教義中，「合一」的基本精神要我們與上帝和好，與基督連結並與人和睦，「合一」的精神在聖愛的表現中流露出來。布瑞頓在這方面的創作，主要使用基督教經文傳達意念與傳統英格蘭的合唱或交響樂曲，代表性作品有：《安魂交響曲》（*Sinfonia da Requiem*, 1940）、《春之交響曲》（*Spring Symphony*, 1949）以及《戰爭安魂曲》（*War Requiem*, 1961），而今日最為人所熟知的應是《戰爭安魂曲》。



2 布瑞頓與皮爾斯於 1975 年 5 月在 Snape 最後一次的合影。布瑞頓終至心臟問題於 1976 年 12 月 4 日過世。（Victor Parker 攝，布瑞頓—皮爾斯基金會提供）

《安魂交響曲》創作於 1940 年，當時布瑞頓只有 26 歲，逐漸邁向成熟的而立之年，他將此曲獻給摯愛的雙親。<sup>10</sup> 這首樂曲根基於基督教神聖儀式而創作，在作品的表達意識上刻意凸顯教會的精神，作曲家似乎想要襯托反戰的信念：「我創作該首作品是盡可能要表達反戰的心聲……，將大家以熟悉的音樂語句連結著新音樂的手法，我想克服某些特定的想法上是極有可能的……，我是引用了安魂彌撒當中的末日經（*Dies Irae*）。」<sup>11</sup>

另一首表達「合一」精神的《春之交響曲》為三位獨唱、混聲合唱、男童合唱以及大型樂團的交響曲形式，從表面結構上來看，只是「合唱交響曲」，但從創作動機深思，作曲家為何選擇創作這樣的作品？當時布瑞頓一直在尋找一種大規模的合唱型式，意欲傳承英格蘭合唱傳統；另一方面，布瑞頓借用合唱與交響形式的空間，進行作曲家的自我反省，回應一連

串國際政治局勢，如：1945 年日本遭受原子彈的事件、1948 年甘地（Mahatma Gandhi）遇刺。我們可以從曲子的時代關聯推測布瑞頓對這位印度聖雄表達由衷敬意，同時藉此展露他和平主義的信念。根據學者 Philip Reed 的研究指出：「或許我們可以認為《春之交響曲》（1948-49）能部分滿足布瑞頓的需求，為三位獨唱、混聲合唱、男童合唱以及大型樂團（與《戰爭安魂曲》相同結構），英格蘭抒情詩當中具有『布瑞頓式的文選集風格』，《春之交響曲》是一首典型的樂曲，將此風格帶入合唱傳統之中」。<sup>12</sup> 其中一段歌詞取材自英國作家奧登（W.H. Auden, 1907- 1973）的詩作《夏日夜晚》（*A Summer Night*），<sup>13</sup> 原是表達對英國政府漠視風起雲湧的戰事卻仍保持現狀，詩中極盡挖苦的譴責，正好與作曲家內心的困境與無奈不謀而合：

高貴的仁慈者，並不在意知道，  
波蘭之處將東方之弓，箭在弦上，  
暴力所完成之事；  
更不用問對於懷疑的舉動所允許的事  
我們的自由只有在英格蘭的家園裡，  
我們在陽光下的野餐。

為科芬翠座堂（Coventry Cathedral）獻堂儀式創作的《戰爭安魂曲》當中，除了教會聖禮與表現人道的關懷之外，基督教教義所展現的「合一」精神也發揮得淋漓盡致。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為侵略全歐洲，對歐陸發動「閃電攻勢」，而對英倫等地進行空襲轟炸，科芬翠座堂在1940年11月14日遭受前所未有的轟炸而被破壞，根據 Andrew Plant 所形容，教堂彷彿就像是祭物，向上帝獻上「燔祭」，好似與基督一同釘十字架的苦難標誌，<sup>14</sup> 在1962年座堂重建的獻堂宣言中，也強調這是一場獻祭的聖禮。這種「焚燒」的象徵對照舊約聖經《創世紀》22章1-19節描述「亞伯拉罕獻以撒」的事件，上帝透過亞伯拉罕信心的行為回應，亞伯拉罕將他唯一獨子以撒獻上做為燔祭，終究上帝為他預備了一隻羔羊作為「以撒的代替者」，並將滿滿的祝福賞賜給亞伯拉罕及他的後代子孫。而布瑞頓緊抓著這幅意象，特別引用戰爭詩人歐文（Wilfred Owen, 1893-1918）<sup>15</sup> 的詩《一位老人與青年人的比喻》（*The Parable of the Old Man and the Young*），將此意象放入《戰爭安魂曲》當中，其中一段如此描寫：

以撒這位頭生者曾說，父親，  
注視著預備獻祭之物，火與鐵，  
但是做為焚燒祭的羔羊在哪兒？

科芬翠座堂在戰爭中似乎成為英格蘭的「燔祭」，將自己獻上成為普世眾人為求和平的替代物，將所有的憤怒消融，展現基督的饒恕與憐憫，向世人宣告「合一」精神的體現，並在「和解」中尋求寬恕。這種寬容的心境不但展現在布瑞頓

創作的《戰爭安魂曲》之內，同時也顯示在史巴壽（Basil Spence）所重新設計的教堂精神與特質。按照史巴壽建築設計，其主題定位為「衝突後的和解」，一方面使用現代材料建築，緊鄰受創的教堂外殼，反映著新禮拜堂的「合一」意象。第二方面，史巴壽將此建築物視為藝術與工藝的展示品，他十分重視工藝雕塑的裝飾性風格，邀集一些不同領域的設計名家共襄盛舉，例如：蘇葛蘭（Graham Sutherland）設計了榮耀基督的織錦，懸吊在至高祭壇的背後，令人印象深刻；布瑞頓的舞台設計搭檔派柏（John Piper）與阮派克（Patrick Reyntiens）共同完成了寬廣的洗禮池窗戶；艾雅各（Jacob Epstein）創作了聖米迦勒擊敗魔鬼的雕像，座落於教堂入口處外的牆壁之旁。<sup>16</sup>

在音樂上，《戰爭安魂曲》同樣能夠彰顯「合一」的精神，祈求和平的心靈不斷透過聖禮儀式，渴望「願上帝合一的聖靈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和平與寬恕的訴求上，作為向上帝誠心禱告的「音樂禱文」。這首樂曲至今已被公認為反戰的重要代表作品，也是對戰爭、流血衝突、暴力的公開控訴。《戰爭安魂曲》1962年5月30日的首演錄音，於八個月後製作發行，而在短短發行後五個月內，銷售量竟高達200,000片，我們可想而知，這首樂曲在這個時刻必然觸動人們渴望和平的心靈，也捕捉到公眾的期待與想像。<sup>17</sup> 在二次大戰過後，真正的和平一直不曾來臨，1962年美洲出現古巴的飛彈危機，在1964年越戰爆發，美軍陷入戰爭的僵局等等，人們對於戰爭已感到厭倦與疲憊，彼此的心靈衷心尋求饒恕與安寧，我們試想當時正在創作《戰爭安魂曲》的布瑞頓，他的心情不是也像眾人一樣努力尋求安寧之所嗎？

《戰爭安魂曲》中，布瑞頓藉由歐文的詩作《陌生的相遇》（*Strange meeting*），將關係從對峙到「合一」的連結，其中一段歌詞描述兩位年輕早逝的士兵，一位是英國士兵，另一位則是戰爭中敵對的德國士兵，此段詩文意境是為妙門關鍵所在：



我似乎想從戰爭中脫逃  
某些深淵灰暗的壕溝，曠日持久不停地挖掘着  
巨大戰爭掀起隆穹繫回的冷酷花崗岩。  
當夜呻吟卻被阻斷  
在思想中奔流，抑或鼓吹死亡。  
當我沈靜思想這件事，某一件事出現了，並凝視著

定睛觀看中，心摧傷以愴惻，  
舉起憂傷的手彷彿禱告祝福，  
並無砲火連天，否則炊煙瀟瀟而下。  
我說：「陌生的朋友，這裡毫無嗟悼之理」，  
另一位說：「無人能搭救未竟之年」，  
無望。無論你的盼望是如何，  
卻也是我寄望著；荒煙蔓草中狩獵  
世界裡最野性的美感之後，  
藉由我帶來的生趣盎然，使得所有人歡笑，  
在我的哭泣中，煩擾將遠離，  
煩擾必將煙滅。我意味著真理無以名之，  
戰爭的憐恤，可悲戰事逐漸被抽離。  
所有人滿足於我們所蹂躪過的  
不然，不滿足於熱血沸騰，然後四處灑落。  
他們如同雌虎一般迅雷不及掩耳。

萬般俯念退入隱蔽世界裡  
退入一處無牆垣空蕩的避難所，  
然而，當這份碧血丹心力阻戰車之輪，  
我將要上去，清洗他們甜美的水井，  
從水井之中，為戰爭而沈水，  
儘管最甜蜜的水井一直在那兒。

我是你所殺戮的敵人，我的朋友，  
在黑天摸地裡我知道你；因為你皺眉蹙眼  
昨日你刺殺我。  
我擋開了；但我的雙手卻不願意，且冰冷的手。  
（男高音與男中音）  
讓我們安然睡去吧。

布瑞頓運用為死者悼念的哀歌形式，在樂曲中  
設計了聲音的三種空間層次：

第一，靠近觀眾的區域：「兩位士兵」（英國士兵「男高音」，德國士兵「男中音」）的位置，  
由室內樂團（chamber orchestra）擔任伴奏，表現  
人性特質，音樂與歌詞流露語近思深，令觀眾動  
容。

第二，合唱主區域：主要結合歐文的詩作與  
「正式的」儀式性經文的演唱部分，由女高音擔任  
獨唱、大型合唱以及整體管弦樂團呈現形式上的悲  
傷，音樂表現著摧天倒地的哀傷之力。

第三，神聖區域：布瑞頓設置另一遠處場所，  
傳送出由室內管風琴所伴奏的天籟般男童合唱聲  
音，表達出天真、純淨之聲，與人類的經驗隔絕。  
上帝的聖潔光輝由此而出，使聽眾的憂傷感受與聖  
靈合一，返璞歸真回到上帝的聖愛裡，永享福樂。

此外，布瑞頓的《戰爭安魂曲》也刻意為三  
位獨唱者所量身打造，分別是英國男高音皮爾斯、  
德國男中音費雪迪斯考（Dietrich Fischer-Dieskau）  
以及俄國女高音葛琳娜（Galina Vishnevskaya），  
三位主角國籍在戰爭期間的對比性，因為各自不同的  
立場與處境，布瑞頓透過樂曲的呈現，三位主角  
由衝突到和解，充滿著對和平特質極大的訴求。

另一首歐文的詩作《一位老人與青年人的比  
喻》，從聖經主題「亞伯拉罕獻以撒」轉變而來，  
布瑞頓用此主題將自己先前的作品《讚歌 II — 亞  
伯拉罕與以撒》（*Canticle II - Abraham and Isaac*,  
1952）<sup>18</sup> 與《戰爭安魂曲》聯貫脈絡，藉由聖經故  
事的隱喻手法，處理暴力與戰爭議題。例如：這兩  
部樂曲當中有關亞伯拉罕的應許，布瑞頓同樣使用  
賦格手法，由男高音與男中音兩位獨唱加以詮釋；  
另外，一段音樂《獻上驕傲的公羊代替以撒》藉著  
歐文的詩作為回答，布瑞頓仍然以賦格的變化方式  
來為此配樂：

這老人並不想如此作，但卻要殺死自己獨子，  
歐洲一半的子嗣，一個接著一個

布瑞頓並不想以傳統基督教信仰教條直接傳  
達信息，反而藉由神聖儀式襯托人性的悖離與殘  
酷。《時代雜誌》（*The Times*）如此評論：「這

首樂曲並非如安魂曲一般安慰活著的人們，有時候它也不能幫助死者安然睡去。它只是不斷攪擾活著的靈魂，因為或多或少表達對於野蠻行為的譴責，做為一位偉大的作曲家盡其所有能力去喚醒人們。」<sup>19</sup>

從各種反戰意義深遠的作品裡，我們窺探布瑞頓如何運用身為作曲家的天職，他並沒有一味在「象牙塔」內追求新藝術的美學，作曲家認真面對觀眾的需要，一方面推動和平的社會責任之外，另一方面也探求人性價值，祈求「恢復」與上帝和好的關係。正如布瑞頓榮獲第一屆亞斯本大獎（Aspen Award）時，他在演說中說：「世界各地的每個人對於人文價值推展所付出極大的貢獻，原可加以斷定。」<sup>20</sup> 前衛派作曲家戲稱布瑞頓是保守主義者，甚至抨擊他音樂流於新古典的風格，如果我們以布瑞頓創作背後的觀念來看，在戰後大眾生命的破碎與生計的斷絕之時，藝術的價值是在乎作曲家自己？抑或在乎普世人性的尊嚴與寶貴？布瑞頓不是要為自己辯駁，而是強調在引用新的藝術手法上，必須懂得與觀眾進行深度溝通：「藝術家在許多方面感到痛苦，因為沒有辦法直接接觸他的群眾，他的作品就成了『象牙塔』或是『並不引人注目的玩意』。這使得許多當代作品變得隱晦難解，而且不實際。我反對為實驗而實驗的創作，或不計任何代價的追求原創」。<sup>21</sup>

## 結論：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從布瑞頓反戰作品的音樂素材與使用方式，引伸出作曲家和平主義的真正含意，所有創作的藝術價值多數圍繞在語意中的兩個詞根上，亦即基督教人道精神與民族強烈的歸屬感。布瑞頓以基督教人道精神為創作泉源，將一些反戰議題與民族認同的元素，共同轉化成冷靜的禱文儀式，在音樂表現上，極度不穩定的和聲進程，引領聽眾又回到了哀痛的世界裡，這是 Peter Evans 所指出，作曲家從憤怒痛苦中昇華，純然以音樂的意象將「淨化作用」流露出來，與聽眾在心靈上彼此交流：「假如布瑞頓拒絕描繪上帝的憤怒的話，他所創作的末

日經必須顯出令人顫驚的感受，就是上帝對於憐憫亦同樣斷然拒絕，或許在任何其他地方需要如此崇高地懇求憐憫。」<sup>22</sup> 布瑞頓將痛苦的力量展現至巨大而遙遠，終至無以復加的境地，悲涼的異象，令人感到毫無指望。如此殘酷的世界，與教堂的鐘聲呈現極端對比的張力，布瑞頓使用藝術的淨化力量，將聽眾帶往上帝的安然住所，當士兵唱出「讓我們安然睡去吧」，詩班同時吟唱著神聖儀式中的 In Paradisum（在樂園裡），正如耶穌在十字架上痛苦承受世人的罪惡，仍不斷想念著上帝的兒女。我們在儀式中感受到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穌向世人發出邀請：「你們現在與我同在樂園裡了！」。布瑞頓的和平意念轉化成藝術的材料，鋪陳出反戰作品的價值，作品將基督教的教義道德化，同情普遍人性的價值，而上天賦予人的道德良知，並不能隨意剝奪。

儘管布瑞頓使用許多基督教的元素宣揚其和平主義的觀點，但他並非完全相信上帝的本體存有（Being），他比較採用自然神論的觀點，將上帝的本性放在萬有定律裡去進行觀察與領悟，以道德律取代神律作為世界的主權，布瑞頓在潛意識中並不將上帝稱為「神」，而是神聖的同在，將空間場域與時間流動加以神聖化。此外，布瑞頓音樂裡追求基督教的「聖愛」（Agape）精神，其中心主旨在於耶穌基督獻上自己寶貴的生命，為普世眾人贖罪，以慈悲無罪的純潔代替人性本質的不完全。戰爭是人性自私與墮落的具體表露，布瑞頓作品中隱含他內心深處的黑暗，某種來自於社會的壓力與不安，因為他知道人性的軟弱部分只有在基督的聖愛中得到釋放與安寧。在耶穌登山寶訓的教導，如同在馬太福音 6 章 9-13 節的《主禱文》，耶穌教導門徒禱告的責任與使命，應當先求上帝國的降臨，看見上帝的旨意與心意，要在末世的苦難中，與我們同榮同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布瑞頓在各種作品



3 左邊墓碑為布瑞頓，右邊則為皮爾斯。皮爾斯於布瑞頓離世後獨自居住在「紅屋」（The Red House），直到 1986 年 4 月 3 日過世為止。他們簡單的墓碑並排相連，座落於教堂後方。（陳威仰攝）

裡，不時流露以赦罪與饒恕為基礎的基督教教義，如果我們人性真能以上帝的旨意為心，饒恕與赦罪的權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和平的根源就在於此，而並非依靠人本身的努力即能得到「仁愛」、或是使社會對自己所產生的痛苦能夠體諒與認同。

另一項和平主義創作詞根的意涵在於民族的歸屬感上，布瑞頓合唱或是歌劇作品的成分裡具有濃烈的「英格蘭特質」，這份獨具一格的特質流露著民族情感的歸屬特性，同時兼具「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人道關懷。作曲家刻意藉由反戰與人性衝突的題材，引發英格蘭人潛意識裡蘊藏已久的民族思緒。當布瑞頓在戰爭裡冒著生命危險仍坐船自美返回祖國英格蘭之時，自然有些人提問：他為何不待在美國？布瑞頓的回答十分巧妙得體，他藉由歌劇《彼得葛萊姆》的主角彼得這個角色來回應此問題：

我是道地的英格蘭人，生根於此  
那麼本身又是根植於什麼呢？

因為那種熟悉的田園、沼澤，以及沙灘、日常的街道，飄動趨勢的氣味。<sup>23</sup>

布瑞頓的和平主義是以「為道德良心、或宗教信仰拒服兵役」為前提，拒絕為任何理由打仗，即使到了 60 年代美蘇冷戰期間的緊張對峙，布瑞頓繼續表達強烈的訴求。這種和平主義的主張是天生賦予的道德勇氣，以另一種形式作出抗議，與所謂的「愛國主義」是不相違背，更不是一般人所認為的怯懦與無能。

最後讓我們以布瑞頓對於《戰爭安魂曲》作品的一段訪談紀錄作為窮根究柢的立論，和平主義的意念在布瑞頓作品的音樂語彙裡幾乎是作曲家人道的精神表現：「雖然這首音樂相當崇高，但是對我而言，既不在那，也不在這，重要的只是信息。然而，音樂就是一種信息，作曲家應該非常瞭解這件事，那些開始喜愛這種聲響的人，如今卻處在悲慘冒險狀態中，如此感同身受。」<sup>24</sup>

（本文圖 1-2 感謝布瑞頓－皮爾斯基金會同意使用。）

## ■ 注釋

- 1 RonaldDuncan. (1981). *Working with Britten: A Personal Memoir*, 103-104. Devon: The Rebel Press.
- 2 這篇訪談後來刊登於 1971 年 6 月 7 日《衛報》(The Guardian)。學者 Humphrey Carpenter 將此段收錄其書中。Humphrey Carpenter. (1993). *Benjamin Britten: a biography*, 10.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3 Imogen Holst. (1980). *Britten* (3rd ed), 65.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4 BPL 館藏編號: 1- 02053791 Benjamin Britten. (4 May 1942). Statement to the Local Tribunal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Aldeburgh: BPL).
- 5 Ronald Duncan 為《貞潔女盧克雷蒂亞》(The Rape of Lucretia, 1946) 劇作者, 同時, 他也出版了小冊子, 標題為《全然的和平主義者》(The Complete Pacifist)。
- 6 Mervyn Cooke. (1996). *Britten: War Requiem*, 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 Andrew Plant. (2009). Fire and Iron: Britten and Pacifism. In Jonathan and Ariane Bankes Reekie (Eds.), *New Aldeburgh Anthology* (p. 143). Suffolk: The Boydell Press.
- 8 在布瑞頓 1936 年的日記裡提到對於「西班牙內戰」問題的痛苦反映, 他十分同情為了反對此案而與政府衝突的年輕族群, 也抗議自己的政府竟然願意花費 300,000,000 英鎊在支持一個人類屠殺機器。
- 9 布瑞頓與皮爾斯搭乘瑞典商船 Axel Johnson, 由加拿大的 Halifax 港口登船出發。Christopher Headington. (1981). *Britten (The composer as contemporary)*, 59. London: Eyre Methuen.
- 10 這部作品原本是受委託為慶祝日本帝國建立二千六百週年慶而創作, 但因為在作品中固有的基督教經文很明顯的顯露, 造成一種誤解印象, 也使這部作品最後被委託者日本當局拒絕了。
- 11 Andrew Plant, Fire and Iron: Britten and Pacifism. In *New Aldeburgh Anthology* (p. 144).
- 12 Philip Reed. (MAY/JUNE 2012). Farewell to Arms. *Choir & Organ* (p. 56).
- 13 在《春之交響曲》的詩詞, 皆由布瑞頓摘引一些詩人的詩作, 除了好友奧登之外, 同時也使用了 16 到 17 世紀的英格蘭詩人的傳統作品, 如: Edmund Spenser、John Clare 以及 George Peele 等。
- 14 Andrew Plant. Fire and Iron: Britten and Pacifism, 143.
- 15 歐文被稱作「戰爭詩人」, 在他詩作的序文, 有一段話提到他身為詩人對普世人性的責任: 「我的主旨是戰爭, 以及戰爭的悲憫。而詩作是在這悲憫當中, 今日所有詩人能做的事就是發出警訊。」
- 16 Reed Philip. *Farewell to arms*, 57.
- 17 Michael Oliver. (1996). Benjamin Britten, 174.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 18 布瑞頓創作《讚歌 II — 亞伯拉罕與以撒》為女低音、男高音與鋼琴而創作的作品, 引用中世紀 *Chester Miracle Play* 當中的一篇〈羅得與亞伯拉罕的歷史〉(Histories of Lot and Abraham) 的詩文, 本書得自於好友克羅澤, 其版本由 Alfred Pollard 所編輯的 *English Miracle Plays, Moralities and Interludes: Specimens of the Pre-Elizabethan Drama*。讚歌系列可說是布瑞頓在 1950 年代重要的特色, 此外, 布瑞頓亦根據神蹟劇裡面的另一篇創作出《挪亞方舟》(Noye's Fludde)。1961 年布瑞頓將《讚歌 II — 亞伯拉罕與以撒》裡面的音樂素材與意念, 帶入《戰爭安魂曲》的創作, 其中角色運用形成了一個比喻類型「老人與少年人」的對比性, 引用自 Wilfred Owen 的詩作 (1918)。該部讚歌與另外兩部《貞潔女盧克雷蒂亞》、《春之交響曲》同時提獻給其好友女低音 Kathleen Ferrier。
- 19 Andrew Plant. Fire and Iron: Britten and Pacifism, 146.
- 20 布瑞頓於 1964 年 7 月 31 日獲獎時的演說, 由亞斯本機構 (Aspen Institute) 頒發, 該機構由 Robert O. Anderson 創建於 1963 年, 讚揚對「人文研究特殊貢獻者」。布瑞頓在第一屆數百位藝術家、學者、哲學家、詩人、作家與政治家當中獲選, 由機構主席 Alvin C. Eurich 頒獎表揚, 地點則是在亞斯本圓形劇場 (Colorado)。Benjamin Britten. (1978). Benjamin Britten on Receiving the First Aspen Award (Aspen Institution, Ed.), 8. London: Faber Music Limited.
- 21 Jonathan and Ariane Bankes Reekie. (Eds.). (2009). *New Aldeburgh Anthology*, 76-77. Woodbridge, Suffolk: The Boydell Press.
- 22 Andrew Plant. Fire and Iron: Britten and Pacifism, 147.
- 23 引述導演克羅澤的觀察, 參 Eric Crozier & Nancy Evans, 1994/6, 7-20.
- 24 引用 Charles Osborne 對布瑞頓的訪談記錄。這一篇專訪刊登於 The London Magazine 3, (Oct. 1963), 91-96. Kildea, *Britten on Music*, 249.

## ■ 延伸閱讀

- Britten, Benjamin. (1978). Benjamin Britten on Receiving the First Aspen Award. (Aspen Institution, Ed.). London: Faber Music Limited.
- . (1964). *On Receiving the First Aspen Awar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 (4 May 1942). "Statement to the Local Tribunal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Conscientious Objectors". Aldeburgh: BPL.
- Carpenter, Humphrey. (1993). *Benjamin Britten: A Biograph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Cooke, Mervyn. (1996). *Britten: War Requi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zier, Eric, and Nancy Evans. After Long Pursuit - Eric's Story Continues: Fifty Years of Peter Grimes. *The Opera Quarterly*, 10: 4, no. Summer (1994/6): 7-20.
- Duncan, Ronald. (1981). *Working with Britten: A Personal Memoir*. Devon: The Rebel Press.
- Headington, Christopher. (1981). *Britten. (the Composer as Contemporary)*. London: Eyre Methuen.
- Holst, Imogen. (1980). *Britten*. (3rd e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Kildea, Paul Francis. (2008). *Britten on Mus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llard, Alfred W. (Ed.). (1927). *English Miracle Plays, Moralities and Interludes: Specimens of the Pre-Elizabethan Drama*. (8th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Reed, Philip. Farewell to Arms. *Choir & Organ*, MAY/JUNE 2012.
- Reekie, Jonathan and Ariane Bankes. (Eds.). (2009). *New Aldeburgh Anthology*. Woodbridge, Suffolk: The Boydell Press.